

仓石武四郎 著

荣新江 朱玉麒 辑注

仓石武四郎 中國留學日記

啓功題籤



中華書局

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

倉石武四郎 著

榮新江 朱玉麒 輯注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日)仓石武四郎著;荣新江,朱玉麒
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2
ISBN 7-101-03284-2

I. 仓… II. ①仓… ②荣… ③朱… III. 仓石武四郎—文集
IV. K833.1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4448 号

责任编辑:柴剑虹

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

仓石武四郎 著

荣新江 朱玉麒 辑注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朝阳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印刷厂

*

850 × 1168 毫米 1/32 · 11 1/2 印张 · 240 千字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19.00 元

ISBN 7-101-03284-2/K·14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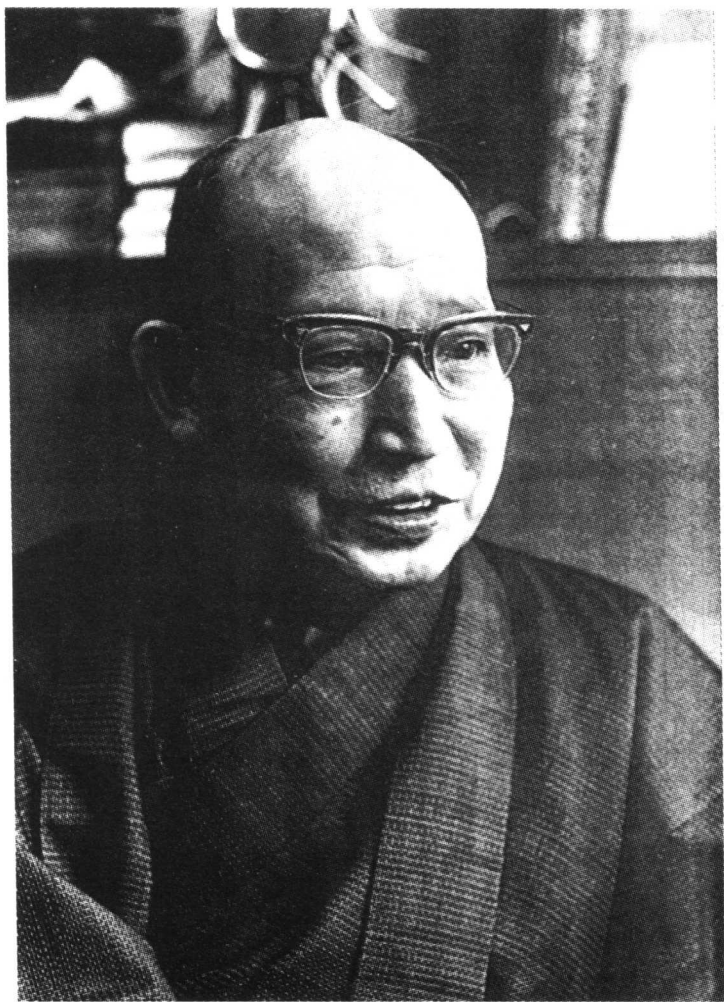


图 1. 仓石武四郎照片(1973)。

72.15/100

述書齋日記卷一

昭和五年太歲壬午春散詳春正月九日曜曹和煦 壬午年三十歲客
中波歲第三次矣 晨起作書奉 家嚴 岳丈 通學齋送來各
首復家絕年序其 明年表圖書集刊校釋和圖書送文道花而午斯現
齋原刊不 得解清尼古云涉園舊藏不 莊始為稿係三十卷 赴木嶺現
用潮州語 始蓋自度古稱歸俗來獻收為官三派解而閱殺風京
也逃輝才之金堂觀北監晉書載元利詩集唐大澤衍義並正德
本無注書字遂暮而歸 雖錄閱書迄不 乙集故內閣大庫古韻足師
書成

十四日陰 中晚分送詳法年錄錄其刊北古文詞道成已付覆翻
其若常余於此可見極處送 道書送其花勝書均還來也
勝也如余未送詳情詳不 已勝借每月錄錄聞是錄一本自稱
刻之二十可以立鈔意則其佳 吉川不評濟川來 錄才
細他忙錄 四書到姑檢查行令 送行者楊錄其錄要來送
先陳後處徐森有錄翻張趙愛雲唐孟起張選賜謝則士中
江橋川松村知錄玉芳吉川水野宗與村並沐趙刻于吉友也同
本則馬臨解必 七改到津過頭通之 同本而不同級也因檢查
煩瑣先到津中康館是故于 乙偶將特表送來取行李檢査

圖 2. 1 月 1 日、6 月 14 日日記書影二幅。

序 一

周一良

仓石武四郎先生是日本中国学研究中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先后就学于日本著名的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后来成为两校的知名教授。他受到京都学派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人的亲炙,在北京留学时,又得到诸多中国国学大师的熏陶。除了在经学、文学等领域里成果斐然外,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战后致力于日本的现代汉语教育,并作出杰出贡献,因而成为现代中国语研究的泰斗。这不仅在日本民众的汉语学习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而且直接奠定了日本中国学研究在战后的发展基石。仓石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创办的日中学院这样的民间语言学校,促进了中日之间的友谊,这更是值得我们敬重的地方。最近,荣新江、朱玉麒同志送来他们整理的仓石的《述学斋日记》,请我作序。我读了以后,有一些感触,写在下面。

首先的感觉是他一个留学生在中国,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钱买那么多的书?而且都是好书。这个问题,我在他的《日记》中没有找到答案,但我从吉川幸次郎先生的《留

学时代》中解决了问题。^① 吉川在中国的留学时间与仓石武四郎先生大致同期而稍后,他也是日本中国学方面与仓石武四郎比肩的重要学者,在《述学斋日记》中记载了许多两人的交往。吉川拿的是上野奖学金,每月 200 日元。他们留学的时候正赶上中国银价有史以来的暴跌,200 日元相当于中国的 500 元,差不多是中国教授的工资。他们在北京每月的住吃总共不到 100 元,有 400 元可以买书。仓石武四郎作为文部省派出的留学生,每月的奖学金比吉川还要多。吉川的回忆解决了我的疑问,同样值得提供给这本书的读者参考。

另一个感受是,他们在中国的留学都是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走。像买书一事,也是完全跟中国学者一样地与书贾打交道,一般是由书友将一种书的头本送上门来,四五天后,再来询问,要,就把全套书拿来;不要,就把这头本书拿走,和我们过去买书一样。这是中国旧式书店的交易方式,主要用来防止书贾再将该书同时售与其他人。类似这样彻底的中国式生活,我想对于他们理解中国的文化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感触是,他俩来中国时,仓石已经 32 岁,吉川也已经 25 岁,这个年龄学习外语已经晚了,而且我们知

^① 载《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二十二卷,东京筑摩书房 1975 年 9 月版。这本书我在北京没有找到,承蒙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窪添庆文先生(魏晋南北朝史专家、御茶之水女子大学教授)托人从日本复印寄来,特此致谢。

道日本人学外文发音有困难,学汉语尤其困难。怎么学习?我也是从吉川的回忆里找到的答案,就是学习《红楼梦》。仓石和吉川刚来北京的时候,找了个旗人,叫奚待园,来为他们讲解《红楼梦》。每天上午三个小时学一回,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学习了四个月,这无疑为他们打下了非常好的中文基础。我们知道,《红楼梦》是一部描写清代满人生活的小说,以北京为生活场景,对于学习口语很重要。读《红楼梦》,是学习中文的很好办法。这在仓石后来写的《关于延英舍》中也有深情的回忆。因此,我想我们学习日文或者其他的外文,也这样就好了。仓石和吉川后来都成了中国学的大家。我与吉川幸次郎见过面,他用流利的中国话与我交谈,没有任何障碍,确实令人感佩。仓石先生我没有接触过,但他后来以中国语教育而名家,并在 NHK 电台录制汉语拼音,显然汉语口语也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此外,他们两位在留学期间一心向学的诚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当时来中国留学的日本人中,他们听讲最认真。那时的北大有三沈(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二马(马裕藻、马衡)、一钱(钱玄同)为代表的国学专家,而他们听课不限于北大,还到私立的中国大学听讲,那里有经学大家吴承仕先生,有文献学家孙人和先生。他们不光到新式的学校听讲,还以旧式的拜师方式听私人讲学,如每周一次到杨钟羲先生的雪桥讲舍听课。在仓石日记中,我们看到他几乎每天都在不停地听课,很专

一地攻国学。据仓石回忆,有一天到北大红楼听马裕藻的课,大雨滂沱,中国学生一个都没来,只有仓石和吉川两个旁听生坐在课堂里,也可见他们向学的诚心。

最后,还有一个感想,就是他们与中国学者的频繁来往。当时中国的著名学者,他们大多登门拜访,并得到热情的接待,比如陈垣。他们对于陈寅恪、陈垣的学问,都有很高的评价。我特别注意到他们对陈寅恪先生的记载。他们没有去过陈寅恪先生的府上拜访,但都说到在一次宴会上与陈寅恪先生认识,而且都对陈先生的言谈印象很深。仓石的记载说:“陈氏论如利刃断乱麻,不愧静庵先生后起矣。”吉川的回忆则说:“这人看起来很敏锐,有西田几多郎先生年轻时的风貌。”仓石把寅恪先生比作后起的王国维,吉川则比之为西田几多郎(1870 - 1945),而西田先生是当代日本大家公认的唯一哲学家。我想他们两位是很有眼力的。

荣新江、朱玉麒同志的整理工作做得很细,我读了他们的整理本后,把感想写下来,作为书序。

2001年8月10日记于蓝旗营新居

(本文承荣新江、朱玉麒同志笔录,谨此致谢)

序 二

史 树 青

吾友池田温教授致力于中国历史考古及日中文化交流史研究,成绩卓著。一九九三年三月在北京讲学期间,与夫人翬子女士住友谊宾馆,其地距余新居中央民族大学宿舍甚近,问学谈艺,多所过从。一日,以所藏《述学斋日记》手稿见示,知其书为翬子女士之父仓石武四郎先生自一九三〇年元月一日至八月六日(农历己巳年十二月二日至六月二十三日)居我师孙蜀丞先生西城西养马营三号宅之留学日记。其地距中国大学甚近,时杨树达、吴承仕、孙蜀丞、范文澜诸先生皆在该校任教,以便于来学也。日记内容丰富,所学甚勤,访友访书,所交皆当代通儒硕士。时仓石武四郎先生三十四岁,在北京已两度元旦,大有“谈深新语浑如旧,住久他乡已似家”(日记语)之感焉。

池田温先生夫妇以余粗通近代史事,并因曾受业于孙蜀丞先生,颇识书中所记人物,嘱为考证。余因俗务羁身,仅就所知,有所谈助,而内容大义,未遑稽出。

今荣新江、朱玉麒二先生以日记有关中日两国人民

友好、文化学术交流，自愿整理成书，并分上、下二编，上编对日记作了详尽的注释，下编为仓石武四郎的《留学回忆录》，包括日记之前的山西之旅、在延英舍的生活，与旧文人杨钟羲的交往、与新文人鲁迅的交往，节选在中国语方面留学听课的经历及与其他中国学者的交往等部分。这是结合日记对作者留学中国的全面研究。尤其附录了在日本举行的仓石武四郎博士座谈会译文，更可以看出仓石先生一生治学的始末和成就，及其对中日文化交流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仓石先生的巨大贡献，荣新江先生在本书的前言中，作了十分详细的论述。我仅就日记引首无栏格纸仓石先生所书七绝一首略陈所见。“词章家每争朱义，藏弃家偏竞宋刊。我是两家门外汉，但沾古泽一心欢。”这短短的二十八个字，看出了仓石先生青年时期治学的要旨。他与理学家朱熹的注经大义和藏书家竞购宋版古书不同，只愿得到一些普通古籍就心满意足了。我们还从他的日记中看到的购书目录，可知他是一个很关心清人著述的学者，对高邮王氏祖孙三代（王安国、王念孙、王引之、王敬之）的治学精神，很感兴趣，几度想到高邮访书，既了解地望，或能得到诸家更多著述。但是这种愿望，终未实现。

仓石先生的购书，与清代藏书家钱曾所言藏书之道相近，即“有藏书者之藏书，有读书者之藏书”，仓石先生是读书者之藏书，这是十分清楚的。他回国后著《段懋堂

的音韵学》，完成了多年的心得。盖文字训诂之有段、王，诗家之有李、杜，文家之有韩、柳，皆一世并出，旷世罕伦者也。

仓石先生对我国的友好和尊师，态度是一贯的。除了杨钟羲、吴承仕、钱玄同、伦明、俞平伯、赵万里、孙蜀丞诸先生外，多数专家学者以及琉璃厂书业人员，与先生交往，皆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荣新江先生在本书的前言中提到：“通过日记，还让我们检验了作者在慎独之际也保留着的正直、善良的人格风范，——作者虽然在《越缦堂日记》的影响下开始日记，但他未必会顾念到这一日记最终在中国的出版，所以其中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令人感动的。”他对杨雪桥先生、孙蜀丞先生更为尊重，日记四月九日“宛亭（吉川幸次郎）来，与蜀丞先生鼎坐谈天”，可见三人关系十分亲切，甚至孙先生手书送仓石先生赠别诗及个人小照至今仍保存完好。更有甚者，一九四〇年杨雪桥先生在北京逝世，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二人联名从日本寄来挽联，深表对雪桥先生的痛悼，联语是：“文垂百代，幸喜先占化雨；道冠千秋，且看共被遗风。”（寒斋藏杨雪桥先生哀挽录抄本）表达了两位日本学者对雪桥先生的尊敬和怀念，“共被遗风”，可以告慰老师之灵了。

仓石先生的治学内容，前后虽稍有变，但和吉川先生一样，其尊师重道，及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存的，也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模范。

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日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序 三

池田温

由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先生(专攻敦煌学、唐史及中西交通史)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朱玉麒先生的共同努力,仓石武四郎先生的《述学斋日记》校注本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真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

仓石武四郎先生在其七十八年的漫长一生中,一直为学习、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默默地倾注了毕生的热情。特别是1930年前后在中国留学的两年多时间,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为充实的鼎盛时期。这位年仅三十三四岁的京都大学文学部副教授,在古都北京和好友吉川幸次郎一起完全像中国人一样地生活。我曾经听仓石先生说过:有一天陈援庵先生去仓石先生寄宿的孙人和先生家拜访,他来到了仓石先生住的房间,环视一周之后,指着铺着的坐垫说:“只有这个不是中国的东西。”

笔者在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读本科生和研究生期间,曾经听过仓石先生一年的中国文学史课,并各参加了一年仓石先生主持的唐诗(李白、杜甫、白居易)研究班和

《世说新语》研究班,此外还在暑假期间参加过几天汉语学习合宿,因此,直接聆受了仓石先生的教诲。但是在他众多的学生中,我跟他接触的时间有限,亲近程度也不如其他学生,其实并不适合谈论他。关于他的经历、学术成就及《述学斋日记》的价值,荣新江先生已在《前言》中详细介绍了。关于他的人品,附录《学问的回忆——围绕仓石博士的座谈会》等也已谈得很多了。因此,我在这里就介绍一些他的个人生活吧。

仓石先生兄弟姐妹很多,除了早逝的三个姐妹及一个兄弟外,长兄太郎(东芝公司副社长)以下,有文三郎(高田市市长助理)、五郎(成蹊大学德语教授)、六郎(福冈气象台台长)、治七郎(日本生命常务)、かう(坂口谨一郎夫人)、すゑ(金沢寿吉夫人)、やへ(小学图书馆员、花道及茶道老师)。他们九个兄弟姐妹以互相之间关系甚好及社会活动极为广泛而著称。他们的家族不仅在故乡新潟县上越(旧高田)市很有名,就是在全日本也是数得着的。

仓石先生的太太丰子夫人(川上善兵卫三女,1903-1978)曾说过,仓石先生的母亲ミカ女士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因为子女有十几个,一个一个叫起来太麻烦,所以她打算叫 JISHICHIROちゃん而一下子又想不起来的时候,就叫成 GORO-TAKE-JISHIちゃん。仓石家族有一个称作いせや会的家族组织,1989年曾做过一本30页的油印名册。

仓石先生和丰子夫人之间育有以下四男二女：

仓石武四郎子女名字	取名由来
尹子 TADAKO 1925 - (赖惟勤夫人)	郑子尹(名珍)《仪礼郑注句读》
衍 HIROSHI 1926 -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
晋 SUSUMU 1931 - 1993	江晋三(有诰)《江氏音韵学十书》
肇子 AYAKO 1932 - (笔者之妻)	胡培肇《仪礼正义》
庸 ISAO 1935 -	段若膺*(玉裁)《说文解字注》
馥 KAORU 1937 -	桂馥《说文解字义证》

* 膺、庸二字在日本语中音同、形近,仓石先生即取与膺相近之庸字为三男之名以纪念段玉裁。

在笔者 1960 年 1 月于神田学士会馆举办的结婚宴席上,婚宴临近结束时,仓石先生在池田、仓石两家亲属及来宾共计 40 多人面前,以新娘父亲的身份致了词。在致词中,他解释了子女名字的由来。原来他是从孩子出生时他正在读的著作的作者的名或字中取一字来给孩子命名的(参上)。1925 至 1932 年间,他读了《仪礼》的注释,1926 年前后,他读了《尚书》的注释,1931 年时,他对江氏音韵学发生了兴趣,1935 年以后,他主要致力于《说文》的研究。当时,在东方文化学院的京都研究所(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部的前身)里,仓石先生在安静的环境中日夜埋头钻研中国古典著作。去北京留学也是在这一时期,回国的第二年,二男晋诞生了。

他对子孙的增加从心底里感到喜悦,对于孩子们今后的人生道路,他则任由他们自己决定。结果他的四个

儿子衍(应用微生物学)、晋(植物学)、庸(教育社会学)、馥(摄影技术)均从事科技工作,两个女儿尹子和翬子分别为京都大学临时教务员和幼儿园教师,她们各自爱好和歌和折纸手艺。现在仓石先生有孙子八人、曾孙八人。很不好意思,虽然他们都未能如仓石先生所期望的那样,但这也是日本已过了发展期进入高龄社会的反映吧。

仓石先生对任何东西都非常爱惜。对于他个人所拥有的大量汉籍,无论是在大学,还是后来在日中学院的研究室里,他都制作高至天花板的木头书架来存放。对于清人文集,为了方便自己取读,他还专门按作者的地域来区分,编成11本目录,并依次上架排列。对于来信及大小笔记本,他也都精心保存。他在留学期间旅行时所记的小型笔记本,现在还留有数册。他保存的来自二百多名中国人的三百多封书信中,傅惜华、王古鲁、陈文海、孙楷第、罗继祖、孙蜀丞的来信居多,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令人缅怀。在京都时,由于租住的房子很大,不仅存放东西完全没有问题,甚至学生、进修生等还可以来寄住。但是在东京时,住处非常狭小,甚至于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尽管如此不便,仓石先生却没有丝毫的抱怨,而是每天孜孜不倦地从事词典编纂和备课。如果说休养的话,也只是夏天和家人去长野县雾峰的山庄短暂地停留几天而已。

仓石先生出生于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和日俄战争(1904-1905年)之间,长于近代日本的成长和对

中国大陆侵略期间。他经历了日本的战败、接受波茨坦公告、向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国无条件投降,并度过了战后贫困的日子。后来,在中国文革动乱波及到日中学院的内部纠纷时,他在辛劳中倒下了,终年78岁。仓石先生从中年到晚年虽然公务极为繁忙,但仍以坚忍的精神克服困难,完成了中日、日中两词典的编纂并创办了汉语学校。仓石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完成了其所选择的社会使命并尽享天年的一生吧。本来没有记日记习惯的仓石先生在其年轻时留学中国的最后几个月中留下了一部《述学斋日记》。现在这部日记即将出版,如果它能满足中国学界的要求并能为日中友好的进一步深化做出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的话,我相信仓石先生的在天之灵一定会莞尔而笑吧。

最后,我谨向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对该日记进行了详尽的校注并将该日记编纂成书的荣新江、朱玉麒两位先生及在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的今天能够出版本书的中华书局有关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镗译)